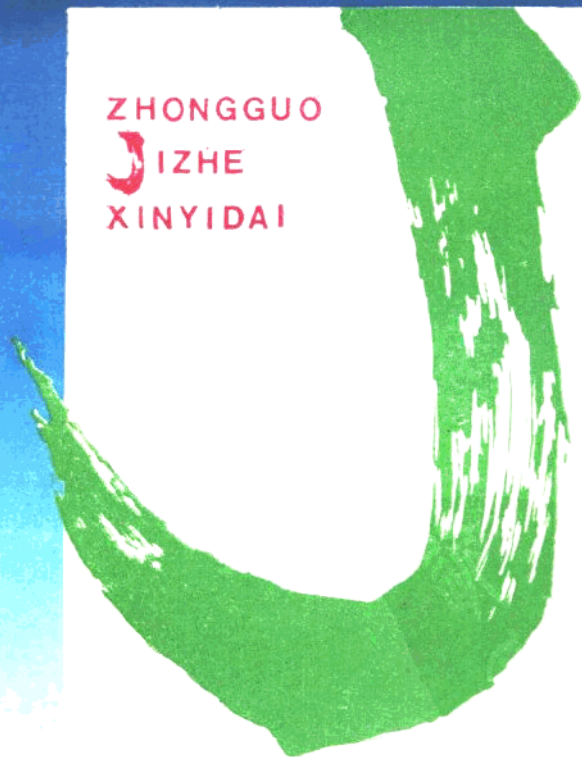


中国记者新一代

主编 王益民

武汉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JIZHE
XINYIDAI



前 言

本书经过(1988年5月—1991年7月)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着实令人高兴。

如何编好这本书,编者自感责任重大。此间,尽人皆知的国家政治事态的发展变化,使本书的编选质量经受了一次严格的检验。这是好事。而今它的出版问世,恰似一个难产婴儿在母腹中几经周折之后呱呱堕地,真是善哉如斯也!高兴之余,同仁们也就如释重负:既感到尽了我们所能尽到的编辑职责,又了却了我们当初计划编好和出好此书的这样一桩算是美好的心愿。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除个别同志是新闻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老记者外,其余都是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新闻史论教研室的教师。编辑此书的目的,完全出于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同时,为的是给新闻专业的同学们、新闻实践岗位上的记者编辑同志们、以及对新闻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广大通讯员们,提供一本可资借鉴、学习的读物,提供一份可作研究、讨论的材料,提供一面可以对照对照自己的镜子。

本书入选对象的条件规定为:获得过省市以上先进新闻工作者称号或被本单位同行所公认;年龄在50岁以下(即中青年记者,个别可以例外);发表过有影响的新闻作品。而且,由于篇幅和编辑力量所限,还把入选对象的范围仅规定为省市以上报纸,并采取报社推荐和新闻界同行举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这些在当初致全国省市以上新闻单位(报社)领导的征集信函和入选者本人的信函中都已如是声明。所以,本书的32位入选者都是遵照严格的要求和

程序选定的，非编者擅独而为之。这里有新闻单位领导以及新闻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举荐之功，更有本书入选对象的真诚与实意的合作。

与此同时，有一点或许是我们引为自慰和自豪的：这就是高校新闻系教师这种身份和编辑本书的宗旨与目的，使得我们比起其他编者和评选机关显得更为超脱，能完全客观、公正地对待与评价每一个入选对象，不被其他关系和因素所左右。身处新闻教育单位，没有那种一呼而致百应的权威性和号召力，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尺子”毕竟是很公平的。也许，前者是我们的不足，后者则是我们的长处。对入选者在入选标准上的严格要求，以及书中围绕每个人的特点所展开的、带有学术意味的探讨，换一种情况下恐怕是难以完全做到的。

本书征集入选对象时，原拟名《当代中国记者新星》；在《新闻学探讨与争鸣》杂志人物专栏中对入选对象作连续介绍、广泛征求意见时，亦曾称之为《当代中国记者明星》（简介）。出版前，经与出版社的同志共商，决定改名为《中国记者新一代》。我们并非“官方”评选机构，书名这样改定，似有它更大的优越之处。原名虽不存，但义广而实则至，且更增加其客观性及“新一代”所给予人们的强烈感受，何乐而不为？

本书体例，按征稿时所言基本未变：一是入选者传记性材料介绍；二是代表作编评或代表作附录；三是选取入选者本人照片一张刊于篇首。为加强本书的理论色彩与提高内容的层次性，特撰写、辑录与记者观念有关的论文数篇，穿插错落其中。此亦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本书编写人员担当与完成任务情况，亦辑录说明如下：

全书统稿、代表作编评、论文撰写、前言与后记，由王益民完成；

宋汉炎、刘庆鹰、蔡栋、王柏森、何荣德、谢昭良、王太等传记材料由王益民编写；

任中南、钱捍等传记材料由孙礼武编写；
钱钢、司马小萌、杨柏等传记材料由吴廷俊编写；
毛用雄、喻亮鑫、周世康等传记材料由屈高波编写；
宋新柱、赵得录、毕国顺等传记材料由辛智敏编写；
周永龄、米保广、傅燕萍、吕晓琦等传记材料由周萍编写；
罗开富、董玉琴、黄远流、郑菡等传记材料由王放编写；
艾丰、王晨、郑海宁、雷收麦等传记材料由王放、王益民编写。
金涛、简妮等传记材料由卫维、王益民编写。
谨此记叙，敬祈共鉴。

主 编

于 1991 年 7 月 15 日

论记者与时代

王益民

当《中国记者新一代》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从开篇到结尾所涉及的都是入选者简况及其新闻代表作（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那么，即使很精彩，也很有吸引力，无疑它的编写又落入了一个老套：仅在业务经验的层次上观人论事，琢磨其写作技巧与风格。从一般意义上讲，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编辑此书的落脚点。但是，“落脚点”不应成其为“先导”，不应代替对新旨新意的进一步开拓与探求。

论说记者以何为先？“记者与时代”是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这样想。

记者，不能脱离时代而独行其是。他们在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中诞生，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自己的角色面貌。

在《系统理论新闻学》中谈到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时，我作过这样的、与之相关的分析：人类新闻传播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时开始，从口头传播、手抄传播、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人们之间的联系，首先就是最新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没有这个条件，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就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新闻活动从未间断，它是人类社会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交流活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新闻活动在很长时间内一般说只是分散地、非专业地、无一定组织形式地自发进行着。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延续，一是社会物质和技术条件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缘故，二是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封闭禁锢状态而缺乏强烈的传播意识，只能算是一种

“自在传播”行为。与这种情形不同或者相反，后来由新闻机构所进行的传播活动，则是有组织的、专业化的、面向社会不特定大众的。它一方面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有效地延伸了人们的视听器官；同时传播者具有高度的传播觉悟，这种新闻传播活动，就是一种“自为传播”。从“自在传播”到“自为传播”这一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转折点和唯一标志，就是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新闻活动才以职业化、大众化的形式进入人类精神文明的殿堂，成为社会结构中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众传播机关、社会舆论机关、阶级政党的宣传机关，并日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意义和巨大影响力。

以上分析说明：有人类社会就有新闻传播活动，但是，并非一有新闻传播活动就有记者。记者，是在人类社会新闻活动从“自在传播”到“自为传播”的转变时期即新闻事业最初萌发时与之一同来到世上的；记者的“角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也即受到新闻媒介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带有很深的时代印记。

新闻事业的最初表现形态为近代报刊。据考证，“早期的印刷报纸是在15世纪中叶……出现的”，“16世纪初，德、法、英等国先后出现了不定期出版的单页印刷报纸或小册子。”^①但是，最著名的近代报刊发祥地应数意大利的威尼斯。史称：14—15世纪，威尼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6世纪初，这个濒临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岸、商业贸易繁盛一时的城市，就出现了最初作为商品出售的“手抄新闻”，通称“新闻信札”。1566年因需求者和订户增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由手抄改为单张印刷，通称《威尼斯公报》或《威尼斯新闻》，售价为一个威尼斯铜币（Gazeta—加塞特）。因其在当时影响很大而具有典型性，以致于“Gazeta”成为了“报纸”的通称，英、法、俄文“报纸”一词都是Gazeta的音译。《威尼斯公报》或《威尼斯新闻》的创办人，可以说就是世界上第一批“新闻工作者”。他

① 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第6页。

们既是记者,又是编辑和发行人,集采、写、编、发于一身,人称“包打听”。“包打听”者,专为他人探听消息之谓也。他们冲破封建习俗的罗网,为社会上不特定大众采集和传递信息,服务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反封建斗争。地位虽属卑微,作用却不可代替。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功莫大焉?

然而,社会的进步是神奇的。如今,新闻工作者具有了当初雏形记者“包打听”根本难以与之相比的名声和地位。自然,这与他们工作其中的新闻事业一个接一个的划时代的变迁,是同道而至的。

新闻事业从最初的萌发而至于今天,经历了一个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有两条主要发展轨迹可以追寻:仅就报刊而言,一是资产阶级新闻报刊的发展,一是无产阶级新闻报刊的发展。资产阶级报刊的发展,从雏形商业报刊,经政党政治报刊、自由企业报刊而至于今日的寡头垄断报刊;无产阶级报刊的发展,从早期工人团体报刊,经由马克思主义革命报刊,而至于今日的以党的机关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报刊。在这一般的发展规律中,自然也少不了个别和例外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中国吧,19世纪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以后,情形就不同一般了。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长道路和国家政治革命就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发展进程极其曲折和复杂。所以,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报刊(主要代表为改良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主要代表为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下的革命报刊)其自身发展情况也就有些异乎寻常。然而,这样一点却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是世界其它国家还是中国,不同阶级的报刊在各自发展的阶段上,没有例外地都出现或造就过与报刊自身和当时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名记者或优秀报人,他们在新闻事业上都作过具有特色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比如,当我们说起本杰明·戴、格里利、德纳、贝奈特等人的名字时,你自然就会想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由单纯的政党政治斗争工具开始走向所谓“大众化”报刊时的那种创业维艰而终获成功的“辉煌”史绩;当我们提到普利策、赫斯特

的时候，你一定又会联想到 19 世纪末美国的“黄色新闻大战”是怎么回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大鱼吃小鱼”的法则所必然造成的新闻业兼并与垄断的来临。如果你听到的是这样三个人的名字：斯特朗、斯诺和史沫特莱，我相信，在你脑海里浮现出来的，肯定是具有亲近感的进步记者的形象——他们同样是美国人，却对我们的事业与理想，对我们的奋斗与社会价值观念，能接近、能理解，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们也是一个时代、一个类型的著名记者！美国是历史上新闻事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它以外的其它国家，如新闻事业发展最早和较早的德国、英国，也就不一一列举其名记者的实例了。

说到这里，特别想到了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 19 世纪中叶、末叶和 20 世纪初，都先后办过报，都是优秀而著名的报纸主编、编辑和卓越的新闻报道及评论文章撰稿人。我们忘不了《新莱茵报》、《火星报》的战斗功绩，也永远忘不了导师们以时代的如椽巨笔为无产阶级报纸实践和报刊思想所写下的那光辉的一页。

至于我们中国，过去的名报人、名记者也是不少的，如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王韬、严复、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章太炎、于右任、宋教仁、柳亚子等等。民国初有黄远生、邵飘萍；其后又有张季鸾、胡政之等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有些共产党人和拥护党的主张而最终同党走到一起的进步人士，因从事新闻工作成绩卓著，也都成了名报人、名记者。如恽代英、萧楚女、蔡和森、邹韬奋；如范长江、邓拓；如穆青、袁木、李普、田流、李峰、柏生、黄钢、金凤、纪希晨、郭超人等等。众所周知，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也是善于利用报刊作宣传的著名报人。

叙述、列举这些实例，不在说明名报人、名记者外国有，中国也有，而是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名报人、名记者的“名”，不是一个意义完全等同的称谓，不是一个价值评价完全没有差别的头衔。名

报人、名记者的“名”，最终是要以时代和阶级的区分来作出评判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方法。离开了这种依据，就不可能对—个记者、报人的功过是非、得失成败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公正的和恰当的评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名记者、名报人的“名”，对他人来说真正的意义又何在呢？

书者，知也，识也，鉴也。古人云，以史、以人、以事为鉴，则可知其兴衰、得失与进退。编书的作用，无非如此。说起中国新闻界，人们似乎有这样—种感受：重视宣传别人，而不善于宣传自己。不善于宣传自己，也许有人把它看成是“谦虚”的美德，但也不尽然。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使这种认识明显地落后于时代了。中国新闻界在自身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中，也需要借助自己队伍中的榜样，以起知、识、鉴的作用，这就非宣传名记者、名报人而莫属了。离我们而去，岁月已较久远的那—代名记者、名报人，史有所述，人们较为熟悉、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数十年间我国新闻界老—辈中的一代名流，也有书目对他们的业绩作了记载和评论。《中国记者新—代》的编写，是想立足于中国，立足于当代，选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闻界—些表现突出、较有成就的中青年记者作为介绍和评说的对象（由于篇幅和力量所限，只涉及省市以上报社），以期为新闻界同仁及广大通讯员同志提供最新榜样，使他们的成长道路、新闻工作经验、优秀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最新历程，为我们所知，所识、所鉴。我们感到，新闻专业的同学首先就有这种需要；而且我们相信，中国记者中的新星们比起老—辈，他们的榜样作用于我们更有接近性。

《中国记者新—代》，因为是立足中国，立足当代，它所评介的人物和事实将告诉我们：当好—个社会主义中国的记者，与当好—个资本主义国家或制度下的记者，其要求是根本不同的，绝不可彼此彼此、相提并论。我们有自己的政治准则和业务要求。一般地说，在政治上要做到无产阶级党性、群众性（人民性）与指导性原则的一致；在业务上要做到真实性、时效性和受众兴趣原则的一致。我

们的新闻观、宣传观和价值观，不能归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所宣扬的那一套，尽管有时候听起来某些说法是那么的相近与相似。对敬爱的读者，我们只能留下一言：莫云编者“痴”，自解其中味。

记者与时代息息相关。记者与时代命运与共。

中国记者新一代，肩负着宣传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任。

“率先垂范，与时俱进。”这是最好的回答。

目 录

前 言	(1)
论记者与时代	(1)

中央报纸部分

艾 丰 (人民日报社)	
一个新闻学者型记者	(1)
王 晨 (光明日报社)	
几回记者梦 成名不自知	(32)
金 涛 (光明日报社)	
从北京到南极	(19)
罗开富 (经济日报社)	
走访长征路的第一人	(67)
钱 钢 (解放军报社——中国地震报社)	
读者通过报告文学认识了他	(77)
简 妮 (解放军报社——中国新闻社)	
魅力出自情真处	(92)
郑海宁 (科技日报社)	
新闻记者的首要职责	(106)
董玉琴 (工人日报社)	
一条艰辛路 一颗探求心	(118)
王 太 (农民日报社)	

关于我——小传无奇·····	(132)
雷收麦 (中国青年报社——中国妇女报社)	
金钢不钩自销魂·····	(147)
杨 柏 (中国青年报社)	
致力于探索的西部记者·····	(164)
论记者的新闻观·····	(176)
论记者的喉舌观·····	(188)

省市报纸部分

毛用雄 (解放日报社)	
新岸,在那未知的世界·····	(194)
周世康 (新华日报社)	
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	(206)
王柏森 (新华日报社)	
关键的一步和关键的几步·····	(219)
宋汉炎 (湖北日报社)	
风情独具 名播楚天·····	(232)
周永龄 (湖南日报社)	
到群众生活的海洋里去淘“金”·····	(247)
蔡 栋 (湖南日报社)	
坚持自学 岗位成材·····	(257)
何荣德 (大众日报社)	
在改革中留下一行脚印·····	(268)
宋新柱 (山西日报社——中共榆次市委)	
脚踏实地朝前走·····	(279)
米保广 (河北日报社)	
来源于土地 扎根于土地·····	(292)

毕国顺 (黑龙江日报社)	
勇做时代的纤夫·····	(302)
任中南 (陕西日报社)	
宝剑锋从磨砺出·····	(318)
黄远流 (四川日报社)	
不断寻找超越·····	(333)
刘庆鹰 (贵州日报社)	
机遇加拼搏:他象鹰那样飞·····	(345)
赵得录 (青海日报社)	
柴达木的儿子·····	(360)
傅燕萍 (内蒙古日报社——天津日报社)	
在草原天空中飞翔的燕子·····	(375)
谢昭良 (长江日报社——佛山报社)	
几番磨练 几度春秋·····	(386)
俞亮鑫 (新民晚报社)	
就这样迷恋上当记者了·····	(401)
吕晓琦 (哈尔滨日报社——新晚报社)	
啊,打动你的心·····	(409)
郑 菡 (郑州晚报社)	
记者是属于社会和人民的·····	(423)
司马小萌 (北京晚报社)	
岂令岁月易蹉跎·····	(433)
钱 捍 (大众日报社)	
把镜头对准广阔的天地·····	(439)
论马克思报刊思想与新闻学现代意识·····	(446)
后 记·····	(455)

[说明:入选者姓名后括号内有两个单位名称者,表示本书编辑期间(1988.5.—1991.7.)这些入选者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

艾 丰 (人民日报社)



一个新闻学者型记者

他，宽宽的脸膛，颇有北方人的气质，凝视的眼睛，透射着哲人的深沉。笑起来的时候，是那样爽朗，毫无拘束。不了解他的人也许说他“傲”，用他自己的话讲，这是少年时残留下来的心态：“骄傲而不自满”“唉！这把年纪了，才作这么多……”他内心里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

艾丰 1938 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1961 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 年，40 岁“高龄”时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这之前，他发表的新闻稿约有数百万字之多，但自称“没有精品”，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记者。

然而，3 年的学习、研究，使他对过去的实践得以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提高，视野大大拓宽了。他写出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1981 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大受欢迎，两次印刷 8 万册，1987 年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励“吴玉章奖金”的优秀作品奖。此外，新闻学著作还有《新闻采访概论》(专著)、《记者的素养和技巧》(合著)、《新闻报道与写作》(合著)，成为中国新闻界很有影响的中年新闻学者。他说：“从青年时代起，曾立志要搞出点儿名堂，但大多数都是‘有志者事未成’，直到 1978 年开始读研究生时，也未想到自己在新闻学上会有什么大的进展，况且，对这方面研究，许多人看不上，没有文学容易出名。结果，竟从这儿‘冒’出来了。”

关于《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他说：“写作此书时，虽自我感觉良好，但求得出版就很不错了；没有想到出版6年之后，竟能与郭沫若、钱俊瑞、吕叔湘等大家的社会科学著作为伍，作为首届吴玉章奖12部获奖作品之一，同时被人们肯定。老实说，当然为自己的荣誉高兴，更高兴的是新闻学终于冲将出来，牢牢站在社会科学园地上，虽然她还比别人矮一些或者矮得多。”

1981年艾丰攻下硕士学位后，分到了人民日报社。理论修养的提高，使他更多地着力于宏观题材和评述体裁的探索。此前，1979年曾发表过揭露黑龙江省王守信贪污集团的通讯《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到《人民日报》后这类有深度、有影响的报道就多了。如1981年的述评性报道《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请把目光投向卫星》，1982年介绍襄樊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通讯《现代化的觉悟》，关于城市建设问题的述评性报道《城市在呼唤改革》，1983年触及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通讯《不完整的答案》，1984年记述引滦入津工程的通讯《背水之战》，介绍全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事迹的通讯《已是山花烂漫时》，1985年的人物通讯《面对生活不等式》，1986年反映唐山大地震后10年巨变的通讯《新唐山的崛起》，1987年的综观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构想的述评性报道《理一理思路》，跨越1986和1987年为改革者说话的连续报道《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追踪夏任凡》，1988年的述评性报道《社会公平的辩论》，以及1989年11月5—6日发表的述评性报道《首钢启示录——从一个企业的改革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等等。其中1985年底以前的主要作品，收入了自选集《思考的笔》。

对于杂文和报告文学也有所涉猎，《青春寄语》、《让青春更美丽》等杂文集中收录有他的作品。

艾丰的新闻作品，取材宏观，有深度，富于哲理性，写法比较新鲜，现正在探索把“新、深、短”结合起来的路子。他喜欢哲学思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艾丰的一位学友在文章中形象

他说：“哲学是他年青时的情人，而新闻是他现在的妻子。”艾丰提倡新闻报道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提倡把记者作为“认识主体”，增强“主体意识”；提倡“多侧面的报道”，主张把“真实”同“全面”、“客观”与“公正”结合起来。他说：“我认为最实事求是的东西，也是最锐利的东西。”

对于成功的理解，艾丰的观点是：“机遇+拼搏=成功”，他说：“机遇就是客观给你提供的达到成功的一瞬即逝的条件或机会。……但机会又要靠人发现，靠人抓住，抓住就拼命干，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他声称：“从哲学上说，新闻记者就应该是‘机会主义者’。”

艾丰认为，社会责任感是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没有这条，其他好条件都难以发挥作用。他真诚地实践着这样一句话“记者应该想总理理想的事情。”

1986年艾丰被评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不久任命为经济部主任，现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1991年1月被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下面是艾丰的《记者答记者问》（见《我的新闻生涯》，有所删节与调整）：

问：有人把记者分成三类：新闻型的，文学型的，学者型的。你同意这种分类吗？如果同意，你属于哪种类型的？

答：我基本同意这种分法。第一种，以其机敏见长；第二种，以其文采见长；第三种，以其知识面和学识见长。三种记者，都需要。但目前，似乎第二种记者，对我们的同行更具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作家似乎比记者地位高。

有人把我归入第三类。我感到很光荣，不过同时觉得不甚合格。

我觉得，学者型记者又可分两种：一种，注意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结合，着力于新闻学的研究，记者兼新闻学者。一种，注意研究自己报道领域的问题，着力于某个专业的研究，记者兼专业学

者。学者的直接表现,就是他有这方面的专门著述。当然,最好是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因为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掌握好两方面的规律:新闻手段的规律,所报道事物的规律。

问:相当一些人认为“新闻无学”,还有些人认为“有学也无用”。你为什么花比较大的力气研究起新闻学来了呢?

答:我搞新闻学研究,是从不自觉到自觉。70年代初,我在广播电台工作,那时电台和各级单位,常常办通讯员学习班,需要人去讲课。“文革”期间,谁愿多说话?抓住个别词句一上纲,受不了。况且,讲业务课还有白专道路的危险。所以,愿意讲的不多。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干新闻的不研究新闻业务怎么行。让我讲,我就去讲;讲了受到欢迎,讲的劲头更大。于是一讲而不可收拾,一直讲到今天。1986年我在申报新闻专业职务时填了这样一句:直接听过我讲新闻课的人头(不是人次)至少在1万以上。绝非虚言。

给人讲课,自己也尝到甜头。讲课可以结识许多同行,人家称你“老师”,尊重你,这是记者“广交朋友”的一个重要途径。讲课逼着你思考。先是总结自己的实践,然后要研究别人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还要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没有讲课逼着,采写工作一忙,这条就被挤掉了;一逼,就要挤空儿干。我的26万字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成书是在1981年,它至少是我近10年讲课,17年新闻实践的总结。许多观点,就是在反复讲课中逐渐形成的。比如,有的通讯员说,听你们老记者讲课,当时觉得挺热闹、挺过瘾,可过后一想,我学不了。你们可以找省长、市长、县长,我连乡长都找不见。于是我想,应该给他们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懂得规律就可以防止模仿而能够自己活用了。最一般的规律是哲学,何不用哲学原理概括一下采访活动中的规律呢?“三个阶段”、“两面挖掘”、“抓关节点”等,这些基本采访方法,就是这样被思考出来了。在书名上,我也第一次把“新闻采访”和哲学名词“方法论”联结在一起了。这本书,第一次印刷5万册,第二次印刷3万册,都在一两月内销售一